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三卷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基佐

F.P.G. Guizot

APL857575-4

ISBN 0-19-586798-X



9 780195 867985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三卷

[法國] 基佐著

沅芷 伊信譯

牛津大學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Oxford New York
Athens Auckland Bangkok Bombay
Calcutta Cape Town Dar es Salaam Delhi
Florence Hong Kong Istanbul Karachi
Mexico City Nairobi Paris Singapore
Taipei Tokyo Toronto

and associated companies in
Berlin Ibadan

Oxford is a trade mark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rst published 1995
This impression (Lowest digit)
1 3 5 7 9 10 8 6 4 2

English text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urope:
From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

歐洲文明化的進程

第三卷

François Pierre Guizot 著

沅芷 伊信 譯

© 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ISBN 0 19 586798 X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in writing of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Within Hong Kong, exceptions are allowed in respect of any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research or private study, or criticism or review, as permitted under the Copyright Ordinance currently in force. Enquiries concerning reproduction outside these terms and in other countries should be sent 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at the address below

This book is sold subject to the condition that it shall not, by way of trade or otherwise, be lent, re-sold, hired out or otherwise circulated without the publisher's prior consent in any form of binding or cover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published and without a similar condition including this condition being imposed on the subsequent purchaser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若未經版權持有
人允許，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Printed in Hong Kong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ina) Ltd.
18/F Warwick House, Taikoo Place, 979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136.122

社會與思想叢書

主 編

甘 陽 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

編輯委員

王紹光 耶魯大學政治學系

王漢生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

周其仁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學系

崔之元 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

陳 來 北京大學哲學系

張隆溪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文學系

劉小楓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歷史悠久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從一九九二年起開始出版中文書籍。這或許預示着：中文這一為十多億人所使用的語言文字，在世界文化和學術的發展中將會日益取得其應有的地位。現在，牛津大學出版社又決定出版「社會與思想叢書」，俾更有系統地積累有價值的中文學術著述和譯述，我們希望，這對於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將會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社會與思想叢書」將首先着重於對中國本土社會與本土思想的經驗研究和理論分析。誠如人們今天已普遍意識到的，晚近十餘年來中國所發生的深刻變革，並非僅僅只是相對於一九四九年以來甚至一九一一年以來而言的變遷，而是意味着：自秦漢以來既已定型的古老農業中國，已經真正開始了其創造性自我轉化的進程。這一歷史巨變已經將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到了中外學者的眼前，例如，鄉土中國的這一轉化將會為華夏民族帶來甚麼樣的新的基層生活共同體？甚麼樣的日常生活結構？甚麼樣的文化表達和交往形式？甚麼樣的政治組織方式和社會經濟網絡？所有這些都歷史性地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的基本課題，同時恰恰也就提供了「中國傳統性」再獲新生的歷史契機。可以說，當代中國的這一歷史變革已經為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的突破性發展提供了充分的歷史可能與堅定的經驗基礎，因為它一方面使人們已能立足於今日的經驗去思考中國的未來，同時也已為人們提供了全新的視野去再度重新認識中國的歷史、中國的文明、中國的傳統性。有鑒於此，本叢書將不僅強調對當代中國的研究，同時亦重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以張大「中國現代性」的歷史文化資源。

社會與思想叢書緣起

「社會與思想叢書」的另一方面則是同時注重對西方社會與思想，以及其它非西方社會與思想的研究。如果說，晚近十餘年來的中國變革標誌着「中國現代性」的真正歷史出場，那麼，七十年代以來西方最引人注目的現象無疑莫過於對「西方現代性」歷史形成的全面重新檢討：在經濟領域，所謂「福特式人生產方式」的危機不僅促發對「後福特時代生產」的思考，而且首先迫使人們重新檢討「福特式生產」的歷史成因及內在闕失；在政治領域，西方現存體制與民權運動以來民主發展的尖銳張力，已重新激發西方近代以來「自由主義 v.s. 共和主義 (Republicanism)」這一基本辯論；在文化領域，形形色色的後現代主義不但已全面動搖近代西方苦心營構的文化秩序和價值等級，而且更進而對「西方傳統性」本身發起了全面的批判。所有這些都提醒人們：自上世紀末以來一直在學習西方的中國人，今天已不能不同樣全面重新檢討中國人以往對西方的理解和認識。因此，本叢書將不僅包括對當代西方的研究，而且更強調對西方歷史傳統的重新認識，特別是西方傳統內在差異性的研究。

本叢書定名為「社會與思想」，自然表達了一種期望，即：對社會制度層面的研究與對思想意識層面的研究，應該日益結合而不是互不相干。從學科的角度講，亦即希望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與人文及哲學領域的研究，能夠相互滲透，相互促進。通過多學科的合作與跨學科的研究去深入認識中西現代性與中西傳統性，以往那種僵硬的「傳統 v.s. 現代」、「中國 v.s. 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方式或將會真正打破，代之而起的是人類對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的同等尊重和相互理解。中文學術世界為此任重而道遠！

甘 陽

一九九三年十月

目錄

第三十講	1
第三十一講	25
第三十二講	45
第三十三講	73
第三十四講	95
第三十五講	127
第三十六講	147
第三十七講	177
第三十八講	199
第三十九講	219
第四十講	237
第四十一講	257
第四十二講	275
第四十三講	299
第四十四講	325

第三十講

從六世紀到八世紀，一切世俗文學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有宗教文學——這一點在這個時期的各種學校和著作中非常明顯——1. 關於六至八世紀高盧的各種學校——大教堂學校——鄉村學校——修道院學校——它們在那裏講授甚麼課程——2. 關於當時的一些著作——文學的一般性質——它已不再是純理論的，它還特別追求科學和知識的享受；它已成爲務實的；知識、辯才、著作已被作爲行動的手段——這個特點在思想上的影響形成這個時期的智力狀態——它幾乎不產生任何著作，它沒有嚴格說來的文學；但各種思想仍然是活躍的——它的文學存在於佈道辭和傳說中——主教和傳教士——第一，關於阿爾勒主教聖·塞澤爾——關於他的佈道——第二，關於傳教士和盧綏爾修道院院長聖·高隆班——這個時期宗教辯才的性質。

先生們，在研究四、五世紀高盧狀況時，^①我們看到有兩種文學，一種是宗教文學，另一種是世俗文學。在人和事兩方面都有顯著的不同；世俗人士和宗教界人士都在進行研究、思考和著述，但前者研究、思考和著述的是俗人的問題，後者則是宗教上的問題。宗教文學越來越佔主導地位，但尚未一統天下，世俗文學仍然存在。

^① 第二卷，第18講，第92—113頁。

從六世紀到八世紀，已不再有任何世俗文學；宗教文學已獨佔天下；只有教士在那裏研究和著述；但他們研究和著述的，除了少數例外，都只是宗教問題。這個時期總的特點是智力在宗教方面的集中發展。這一事實是非常明顯的，不管我們注意的是仍然存在的那些學校的狀況，還是流傳到我們手中的那些著作。

你們可以回想一下，四世紀和五世紀都不缺少由世俗勢力設置並講授世俗科學的世俗學校和世俗教授。我提到過的所有高盧的大的學校都屬於這一類。我還向你們指出過，那時那邊還沒有教士學校，而宗教教義，雖然日益深入人心，尚無法定的正式的機構進行正規的教學。到六世紀末，一切事物都變了樣。那時世俗學校已不復存在，存在的只有教士學校。特里爾、普瓦捷、維也納、波爾多等等的大的市立學校都消失了；代替它們而興起的是叫做大教堂學校或主教區學校的那些學校，因為每個主教轄區都有它自己的學校。大教堂學校也並非總是單獨存在的；我們在某些主教轄區裏，看到有另一些學校，它們的性質和來源我們尚未確知，大概是某些在變形過程中使自己生存下來的古老的世俗學校殘餘。例如，在蘭斯這個主教區內，在離教區中心相當遠的地方就有一所聲望很高的穆宗學校，雖然蘭斯已有一所大教堂學校。大約在這同一時期，教士們也開始在地方上創立另一些旨在培養青年牧師的教士學校。529年，韋松宗會議強烈建議推廣鄉村學校；可實際上它們發展得很不均衡，有些主教區裏創立了許許多多，而另一些主教區裏卻幾乎一所沒有。最後，在各大修道院裏還有一些學校；其智力的訓練分為兩類；某些最著名的修道士既對當地的全體教徒也對正在修道院裏培養的年輕人進行直接的教導。此外，在許多修道院裏還有這樣一種習慣，即修道士們在聽了必須要聽的講

課之後，還得就講課中的主要問題進行討論；這種討論已成爲智力發展和教學的一種有力手段。

從六世紀到八世紀中葉，各主教區區立學校中最興旺的是設在下列各地的這些學校；

1. 普瓦捷。在主教區的各修道院中有許多學校，在普瓦捷本地的，在利居日的，在昂西翁的等。

2. 巴黎。

3. 勒芒。

4. 布爾日。

5. 克萊蒙。該市另有一所學校，人們在那裏講授狄奧多西法典；這種值得注意的情況，我在其他地方沒有看到過。

6. 維也納。

7. 索恩河畔沙隆。

8. 阿爾勒。

9. 加普。

這同一時期最興旺的修道院學校是設在下列各地的學校；

1. 弗朗什—孔泰的盧綏爾。

2. 諾曼底的豐特奈爾或聖范德里爾；該校約有三百個學生。

3. 諾曼底的西杜。

4. 蘇瓦松的聖梅達爾。

5. 勒朗。

要擴充這張名單是很容易的；但修道院學校都遭受過興衰的變遷；它們在某一個著名修道院長主持下興旺起來，而在他的繼承者手裏衰落下去。

甚至在—些女修道院裏，對學習也是很重視的。聖塞澤爾在阿爾勒創辦的那所女修道院裏，六世紀初容有二百個女修道

士，其中絕大部分從事於抄書工作，有時抄宗教方面的書，有時甚至也抄古人的著作。

世俗學校之變成教士學校已完全實現。現在讓我們看看在這些學校裏講授的是甚麼課程。我們往往會在它們那裏看到過去在世俗學校裏講授的那些學科的名稱，如修辭學、倫理學、語法學、幾何學、星占學等；但這些學科除了與神學有關的以外，顯然都已不再講授了。這是教學的基本原則：一切都變成聖經的註釋，歷史註釋、哲學註釋、寓言註釋、道德註釋。它們只希望把學生培養成牧師；一切學習，不論其本質如何，都被導向這個結果。

有時候他們甚至走得更遠：他們反對世俗科學本身，不管他們把這些科學作了甚麼用途。六世紀末，維也納主教聖迪齊厄爾在他的大教堂學校裏講授語法學。偉大的聖格列高利為此尖銳地責備他。他寫信給他說，「一張專供讚美上帝用的嘴竟為讚美朱庇特而開，這是不適當的。」我不確切知道對上帝的讚美或對朱庇特的讚美與語法學有甚麼關係；但顯而易見的是，把世俗的研究貶低了，雖然它是由教士們進行的。

這種事在書面文獻方面也可以看得見，而且更加清楚。不再有哲學的深思，不再有精湛的法理學，不再有文學批評。除了某些年代紀、某些在我以後會講到的場合寫的詩篇之外，我們所有屬於這個時代的就只有一些宗教著作，除此之外就甚麼也沒有了。智力活動只能在這種形式下出現，只能在這方面表現自己。

出現了一種更為重要的但不太察覺得到的革命：不但文學變成了完完全全的宗教的文學，而且這種宗教性質的東西已不再是文學；已不再有任何嚴格意義上的文學。在希臘、羅馬和羅馬帝國覆亡以前的高盧的最美好的時代，人們研究和寫作是

純粹爲了研究和求知的悅樂，爲了使自己和他人獲得理智方面的享受。文學對社會、對實際生活的影響僅僅是間接的，它並不是著作者的直接目的；總之，科學和文學基本上是不謀私利的，它們專心致力於探索真理和美好的東西，滿足於發現它們、享受它們，而決不妄求得到更多的東西。

而在我們現在所研究的時代，它並非如此。人們不再爲了獲得知識而學習；他們不再爲了寫作而寫作。寫作和研究都具有實際的性質和目的。凡是投身於這方面的人都希望對人們發生直接的作用，調節人們的行動，使那些不信上帝的人改變信仰，使那些信神而並不實踐的人有所改進。科學和辯才是行動的手段，統治的手段。已不再有不謀私利的文學，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文學。哲學的、詩的、文學的、藝術的純思辨和理論的性質都已經消失；人們所追求的已不再是美的東西；當人們遇到美的東西時，它起的作用已不再是僅供享受；積極的應用、對人的影響以及權威已成爲現在一切腦力工作、一切智力發展的目的和偉業。

我認爲，這是由於我們對於我們現在研究的時代的這個特點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因此而形成了一種錯誤的思想。我們看到那裏幾乎沒有任何著作，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沒有截然不同於實際生活的無私利的智力活動。人們由此而作出結論，而你也肯定已聽說過這個話，你也可以到處讀到，說這是一個冷漠無情、精神上枯燥無味的時代，一個沉湎於各種物質力量的紛爭的時代，在這種時代裏，有才智的人是有發展的，沒有權力的。

先生們，事實並非如此！毫無疑義，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說得上是屬於這個時代的，不論是哲學方面，詩歌方面，或是真正的文學方面；但並不能由此而說沒有智力活動。顯然不是如

此的。它只是以不同於其他時代的形式出現罷了，它也決不會導致這樣的結果。這是一種完全屬於應用方面的和應付環境的活動，它並不致力於未來，也並不企圖把文學巨著遺贈給未來，只想迷住或教導人們；現在，現在的需要，現在的命運，以及同時代人的利益和生活，這就是它給自己規定的讓這個時期的文學全力以赴的活動範圍。它只產生了少數幾本書，然而它是豐富的，對人們的頭腦有強大的影響的。

因此，原來聽人說的並且自己也認為這個時期是枯燥無味和沒有任何智力活動的任何一個人，當他知道我們在仔細考察後竟在其中發現有大量的著作時，都會大吃一驚，雖然這些著作的確並不十分重要，而且往往不很著名，但從其數量和其中蘊藏的熱情來說，可以證明它是一個罕見思想和豐產的運動。這些著作是佈道稿、教訓、勸告、講經稿和關於宗教問題的討論。任何政治革命和出版自由都沒有產生過更多的小冊子。這些小冊子中，四分之三，不，大概百分之九十九都已失傳：它們注定是在那個關鍵時刻作出的，幾乎全部是當時即席寫成的，很少由其作者或讀者收集起來，所以大都沒有流傳下來；但留給我們的數量仍然不少，它們就成爲一部真實而豐富的文獻。

這個時代的佈道稿、講經稿、教訓等可分成四類。一類是聖經的評註和解釋。這些關於公共信念的不朽之作引起了人們共同的興趣，人們在其中到處看到善良的意圖、暗示、教訓和範例；他們在其中尋找隱蔽的意義、道德的含意、上帝的旨意或隱喻。最崇高的、思想最敏銳的人不斷地在那裏尋找能砥礪自己的某種東西；人們都貪婪地、熱烈地接受了對他們所極爲尊重的、對他們的行爲和生活有實際利益的書的這種應用。

第二類佈道書涉及原始基督教史和那些慶祝其重大事件的節日和莊嚴儀式，例如耶穌聖誕、耶穌受難、耶穌復活等等。

第三類包括用於諸聖和殉道者的節日的一些佈道書；某種宗教的讚美詞，有時是純粹歷史的，有時轉變為道德的規勸。

最後，第四類是旨在把宗教教義應用於生活實踐的那些佈道書，也就是關於宗教倫理學的佈道書。

我不想長期讓你們停留在這種文獻上。要真正理解它，要估計人類頭腦取得的發展程度，要評價它對人類發生的影響，需要作長時期的研究，這種研究往往是冗長而乏味，雖然是富有成果的。這些作品數量之多出乎意想之外，光是聖·奧古斯丁的就留下了三百九十四本佈道書，另外有許多說教用的小冊子，我們掌握的只有一些片斷，還有許多則已完全失傳。我現在只從這些人中選出兩個可能被認為是這個時代活動的最忠實的代表，並將他們的雄辯的某些片斷展示於你們之前。

有兩類佈道者——主教和傳教士。主教們在他們幾乎常駐的設有大教堂的城市裏每周佈道幾次，有的甚至每天都佈道。傳教士主要都是一些修道士，他們巡視各地，既在教堂裏也在公共場所和人群集中的地方佈道。

我們研究的這個時代的主教中最著名的是阿爾勒主教聖·塞澤爾；傳教士中最著名的盧綏爾修道院院長聖·高隆班。我要盡力告訴你們關於他們生活和佈道的大概的情況。

五世紀末的470年，聖·塞澤爾誕生於索恩河畔沙隆的一個早已以其虔誠著稱的可敬的家庭裏。他幼年時在智力和宗教兩方面的傾向引起了沙隆主教聖·西爾韋斯特的注意。這位主教於488年給他舉行了削髮儀式使他獻身於教士生活。他最初出現於勒朗修道院，在那裏苦修了好多年，還常常在修道院內部擔任說教和教學工作。他的健康因此而受到了損害；後來勒朗修道院的院長送他到阿爾勒去進修，501年他在人民的一致鼓掌歡呼中成為阿爾勒的主教。

從 501 到 542 年，他擔任阿爾勒主教之職達四十一年之久，在這整段時期裏，他是南部高盧最著名、最有影響的主教之一。他主持並指導了這個時期的幾次最重要的宗教會議，即 506 年的阿格道會議，524 年的阿爾勒會議，527 年的卡彭特拉斯會議，529 年的奧朗日會議，在所有這些會議中，討論了關於教義和當時的教規的大問題，特別是半貝拉基教義的問題。看來甚至他的活動對政治也並不外行。他曾兩次被逐出他的教區；一次於 505 年被西哥特國王阿拉里克，另一次於 513 年被東哥特國王狄奧多里克，因為，他們說，他希望把普羅旺斯、特別是阿爾勒城讓給他的誕生地勃艮第的國王。不論這個指控是否有確實的根據，聖·塞澤爾很快就被恢復原職、回到人們熱烈地要求把他召回去的他原來的教區。

他在那裏的佈道有強大的影響力，這是他之所以著名的主要原因之一。他的講道稿留傳下來的約有一百三十篇，此數遠少於他實際撰寫的。這些講道稿可以分爲我剛才指出的四類，而且由於足以反映對聖·塞澤爾的尊敬的某種情況，關於教義或宗教倫理學的講道稿大大多於關於諸聖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寓言或頌詞。現在我就前者中摘取幾段來讓你們了解這類文獻的雄辯。^①

在一篇題名爲《勸告信徒們閱讀聖書》的講道稿中，聖·塞澤爾力勸信徒們不要完全獻身於世俗事務，要監視自己的靈魂，要時刻掛念着自己的靈魂。

他說：「親愛的教友們，要照管自己的靈魂完全像耕種土地一樣：我們在田地裏拔掉某些東西，才能插種另一些有益的

^① 聖·塞澤爾的大部分講道稿插在《聖·奧古斯丁全集》對開本 1683 年版第五卷末第 1683 頁奧古斯丁講道稿的附錄裏。

東西，我們對自己的靈魂也應如此……惡的東西應該鏟除，有益的東西應該栽培；要拔去驕傲，代之以謙卑；要反對貪婪，培養慈悲心……任何人只有把田地裏有害的植物清除掉，才能種上有益的植物；因此，你得先把自己靈魂裏惡的荆棘和薊草拔掉，才能種上善的神聖幼芽。我請求你告訴我，你甚至現在也說，你不能實行上帝的十誡，因為你們不能閱讀，那末，請告訴我，是誰教你如何修剪葡萄樹、和甚麼時候可種上一棵新樹的？你閱讀過這方面的書嗎，還是你聽說過這件事？或是你已向能幹的栽培者請教過這件事？既然你如此一心想着你的葡萄樹，為甚麼你不能如此惦記着你的靈魂呢？我的兄弟，我請求你注意，有兩種田地，一種是上帝的田地；另一種是人的田地；你有你的田地；上帝有他的田地。你的領地是土地，上帝的領地就是你的靈魂；那末，只耕種你的領地而忽視上帝的領地對不對呢？如果你看到上地收拾得很好你就很高興；那末，當你看到你的靈魂無人耕種而荒蕪着時，你為甚麼不哭呢？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靠着大地的果實只能生活少數的日子；因此，讓我們把我們最大的注意力轉向我們的靈魂吧……讓我們在上帝幫助之下盡力勞動，以冀當他來到他的領地，即我們的靈魂裏時，他可以看到田地已經耕種，並收拾得井井有條，讓他看到那裏長着的是谷子而不是荆棘，是葡萄酒而不是醋。更多的是小麥而不是稗子。」^①

引用日常生活的比喻，一些熟悉的對句，頗能激起人們的想像力；聖·塞澤爾便大大地利用了它們。他勸告信徒們在教堂裏行動規規矩矩，避免一切使人分心的東西，一心一意地祈禱。

① 《聖·奧古斯丁全集》第五卷，第 509，510 段。